

【编者的话】

网络让发声变得容易。尤其是 twitter、微博出现之后，人人似乎都可以成为媒体。然而在言论的广场，声音是不是一定多样且丰富呢？本期周刊关注“声音”。前段时间，包括李承鹏在内的一些网络意见领袖纷纷宣布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人大代表，这种参与公共事务的行为本该受到尊重和鼓励，但实际上却给他们自己带来了麻烦。本来不过是希望在过分一致的声音中增加点差异，只是这异声还未发出就被干扰。

但和另一个群体相比，李承鹏们发声的空间和能力显然要大得多。传统媒体时代，农民常常是声音的缺席者，新媒体时代依然如此，虽然舆论在对待作为弱势者的农民时表现出善意，但我们依然甚少听到由他们自己发出的声音。

发声的人总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听见，自媒体时代“粉丝”的多少就代表着声音的传播能力。“粉丝”越多自然传播力越强，只是这要在数据真实的情况下。在一些网站，那些拥有几万“粉丝”的人发出的讯息常常仅有各位数的转发和评论，这些不具备任何传播能力的“粉丝”带来的或许只有虚荣。

农学家董时进曾反对“土改”，批评“苏联经验”，指出集体农场最终会饿死很多人。他发出的声音被忽略了，不过他的“预言”在六十年代大饥荒中却一一应验。如果一个时代无法认识到这些独立声音的价值，必定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1510 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录


在 Google buzz 分享本期周刊

【源】

5-1 笑蜀：李承鹏：冲冠一怒为尊严

“李承鹏参选的全部意义正在于他是用实际行动，传递千千万万公民对于尊严的渴望。这渴望赋予李承鹏以强大动力，所以他才能完成个人转型，从原来文字上的指点江山，转到现在的身体力行，不屈不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李承鹏最近有点受伤，为他的儿子珂仔。有家企业先满腔热情地许诺给珂仔赞助，后来却不能兑现。不是企业不讲信用，而是企业遭到压力。压力属于不可抗力，企业只好变卦。

怎么给儿子解释呢？李承鹏遇到了问题。他并不缺钱，据透露，他一年的总收入在 80 万上下，每年捐出去的钱在 40 万左右。相比而言，企业给珂仔的那点赞助几乎可以说微不足道。

但是李承鹏很看重那笔钱，因为珂仔很看重。在珂仔、因而也是在李承鹏的眼里，那笔钱的重量是不能用钱做标准去估算的。它意味着承认，意味着希望--无须劳驾举国体制，市场经济时代，有潜力，有奋斗，就会有机会，李娜的成功就是证明。李娜能，堂堂男子汉珂仔也能。珂仔这么自信，李承鹏当然也这么自信。

对于踌躇满志，渴望振翅而飞的珂仔来说，那笔赞助来得何等好啊，简直就是送东风。但正所谓希望愈大，失望愈大。板上钉钉的赞助，竟转眼烟消云散。这对天真烂漫的珂仔来说，该是何等的难以理喻，何等突然的打击。但更难受的是作为父亲的李承鹏：不仅要遭受同样的重创，而且，他完全没有准备：该如何给珂仔解释，让自己既不至于撒谎，又不至于伤害孩子幼小的心灵呢？

激愤之余，李承鹏网上发飙了。他知道他不讨某些人的喜欢，但无论如何他不会想到，代价会落到他的儿子身上。

那么李承鹏到底做了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据他自己交代，无非因为他要参选某城市的基层人大代表，要做够资格的十三亿分之一的国家股东。单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考虑，他其实没必要招惹这麻烦。要知道参选多累啊，他要走访 N 多街道，要调查 N 多社区，要记录下每个选民的追问和嘱托。把那些时间精力用到走穴上，该换来多少钞票啊。何况，除了经济损失，还有忒多莫测之险呢。

不划算，而且不是一般的不划算，是很不划算。

但是，且不谈性情之人李承鹏如何固执，一旦动了真性情九头牛也别想拉他回来。更重要的是，他不缺钱。他大把大把钱救助贫弱，已经说明相对内心的审美需求，钱真的不算什么。相对一个公民的尊严，相对十三亿分之一的国家股东的尊严，钱当然更不算什么。

所以李承鹏才那么投入。他风尘仆仆走街串巷，他全神贯注侧耳倾听，他甚至不惜主动地而且是谦卑地联系当地公仆，试图沟通和互相理解。这一切不为别的，只为了尊严，只为了争回选票的尊严，进而，争回作为一个公民的尊严。

作为一个公民的尊严，这其实不是李承鹏个人的追求。唐福珍不缺钱，只考虑钱的话，纵然赔偿不公，她的小日子仍可以过得很好，根本犯不上自焚。被强行关进精神病院

的浙江松阳村民李体法，多次短信抨击松阳当局环评作弊，当然更不是为了钱。这样的例子，还可以罗列很多很多。

这是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划时代的转折。过去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性质比较单纯，一般都因利而起因利而散。当下不然，当下很多社会矛盾和冲突看起来争的是利，实际上往往争的是口气，实际上往往争的是尊严。古人早就预见到了，即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荣辱者，尊严之谓也。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李承鹏不孤单，他的背后，是千千万万觉醒了的公民，千千万万对尊严分外敏感的公民。对尊严的这种敏感，或者说对尊严的这种需求，必须要有相应的制度去呵护。只有能够呵护这种需求的制度，才能得到千千万万公民发自内心的认同，也才可能是有尊严的制度，稳定的制度。

李承鹏参选的全部意义正在于此。他是用实际行动，传递千千万万公民对于尊严的渴望。这渴望赋予李承鹏以强大动力，所以他才能完成个人转型，从原来文字上的指点江山，转到现在的身体力行，不屈不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相形之下，用影响珂仔前程的手法狙击李承鹏，则不仅有低俗之嫌，恐怕也没多少用处。这不，珂仔刚在这座城市失去了赞助，马上从那座城市得到了新的赞助。这正是当下中国的一景：多元的社会有无穷的夹缝和机会，只要足够坚韧，总可以东方不亮西方亮。

也就难怪，刚做狮子之吼的李承鹏，很快又出现在长沙的快女盛会上，欢乐而阳光。为什么不这样呢？毕竟，以审美的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怎样辛苦都有愉悦，都有满足。虽有不快也是暂时，如风中乌云，可以一吹而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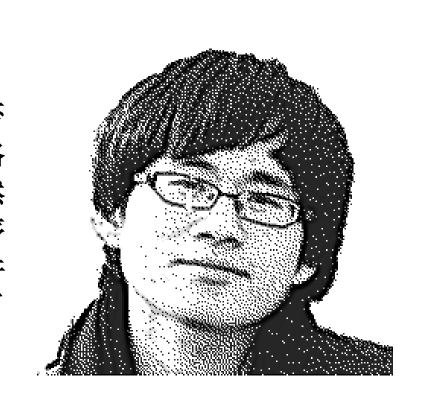
那么，何妨告知珂仔真相，同时请他相信，没有谁能够阻挡他，因为，没有谁能够阻挡地上的春风和天上的阳光。

谨以此文，祝福珂仔，祝福李承鹏，祝福所有为尊严奋斗的公民。

（笑蜀，曾任《中国改革》杂志执行主编与南方周末高级评论员。原文链接：http://news.ifeng.com/opinion/zhuanlan/xiaoshu/detail_2011_06/23/7198275_0.shtml）

5-2 吴琦：“农民”在哪里——对网络论坛中农民话题的文本分析

“网络媒体的勃兴被寄予厚望，而农民正是在传统媒体空间中频频缺席的一个群体，于是便可以追问，新媒体是否可能有区别于传统媒体定型化的表现？更具体地说，在网络舆论这一个更具草根性的话语空间中，农民的形象是否依然扭曲？农民的话语权是否依然失落？强弱失衡的逻辑与秩序是否在这个虚拟舆论世界中依然成立？当传统的大众媒介并没有给农民带来更多的机会和福利的时候，网络舆论带来了真正的希望吗？”



前言

在当代中国，“农民”这个词汇有着多重含义，它既指一种职业，也指一类人群，更多的时候，它代表一种身份。无论是国家政策的重视，还是民间话语的关注，农民问题亦或说三农问题都成为了这个时代一个重要而时髦的课题，被不断地反复地言说、争论和寻求解决。而回到新闻学的视野之内，农民、农村与媒介的互动也受到了研究者格外的关注。

在既有研究中，新闻学与传播学领域的相关研究着力于两个方向：一是从文本切入，研究大众媒介上农民的刻板印象与“失语”状态；二是从媒介使用切入，探讨农民群体的媒介使用情况。两条进路都建立在这样一种共识之上——大众媒介是现代社会中信息和话语的制造工厂，其巨大的影响力左右着意见市场和公众话语，是形成舆论的结构性力量，在大众媒介上声音的强弱，决定了各个阶层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高低。在此基础之上，诸多研究都给出了趋同的结论性意见——认为农民毫无疑问是大众媒介的“缺席者”，因而

也成了社会话语空间的“失语者”，这样一来，农民作为当代中国最庞大的弱势群体，其弱势不仅体现在现实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上，而且也成为传播学意义上的弱势群体。

站在前人研究成果的肩膀上，本文希望做出小小的创新的尝试——把研究目光从大众媒介从传统意义上的报纸、杂志和广播电视转移到网络媒体，并进一步缩小至网络论坛的话语场域之中。网络媒体的勃兴被寄予厚望，而农民正是在传统媒体空间中频频缺席的一个群体，于是便可以追问，新媒体是否可能有区别于传统媒体定型化的表现？更具体地说，在网络舆论这一个更具草根性的话语空间中，农民的形象是否依然扭曲？农民的话语权是否依然失落？强弱失衡的逻辑与秩序是否在这个虚拟舆论世界中依然成立？当传统的大众媒介并没有给农民带来更多的机会和福利的时候，网络舆论带来了真正的希望吗？

于是，本文便尝试进入网络论坛的文本内容，仔细寻找和询问以下四个问题的答案——在网络舆论中，农民是谁？农民怎么了？农民怎么办？农民究竟在哪里？

研究理论与方法

本文主要借重于话语理论来厘清在网络舆论的文本背后的农民问题。

话语是一个如今被广泛用于不同学科领域的概念。按一般的理解，话语指的是人们在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下决定自己该说什么、怎样说的潜在制约机制，是一种隐匿在人们意识之下，却又暗中支配各个群体不同的语言、思想、行为方式的潜在逻辑。“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是指：以“话语”作为语言实践活动或过程的存在为逻辑起点，探讨话语的生成机制和制约机制，并在语言学立场上，重视语言与实践关系、探讨语言与权力关系、研究语言的潜在制约机制的一种研究进路。话语分析理论认为，人通过语言才能理解这个世界，意义出自语言的抽象系统，但由语言产生的意义要经过一定历史、政治和文化才加以定型，通过特定制度下的言说、表述才得以再生和流通。

在本次研究中，笔者主要通过对各个帖子原文的统计整理，呈现出网民讨论农民问题时所进行的语言选择、组合或迷思化（即神话化）的过程，以此来分析网络舆论是如何呈现农民的形象与境遇，又是如何形成对农民的认同。此外，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还必要地使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同时借鉴符号学的研究思路，更广泛也更深入地展开对文本的分析，对细部的切割、对符号的阐释。简言之，本文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这些理论和方法的帮助与引领，从网络论坛关于农民问题的讨论中，清理出其语言的排列组合与使用规律，进而找到网络舆论对于农民问题的认同塑造、意义生成的过程与机制。

研究设计

本文研究的样本范围为 8 周时间内 4 个网络论坛的 122 个议题。在 2008 年 10 月 2 日到 11 月 27 日的 8 周时间内，研究者对新华网发展论坛深水区、凯迪网络猫眼看人论坛、新浪网新浪杂谈、北大未名 BBS 三角地这四个各具代表性的网络论坛出现的议题进行了跟踪[1]。每周记录下各个论坛上当周回帖数最高的 3－5 个热帖。在排除了纯 h 私人话题和没有实质内容的祝福帖、问候帖后，一共得到 122 个网络议题。

笔者发现，4 个网络论坛 8 周之内都出现了有关三农问题的帖子，这种普遍性本身说明了这一问题在网络舆论中的重要位置，可以说，三农问题是本次监测中各论坛所表现出的一大公约数，正因为如此，才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和兴趣，而寻找这种普遍性与共性背后的意义支撑与权力关系，也构成了笔者此次研究和论文写作的起点。

本文从 122 个帖子中进行检索，从中选取 10 个帖子作为本次研究的样本帖，选择标准如下：

1、主帖中含有“农民”、“农民工”、“农村”、“农业”等关键词。共 5 个帖子：

新华网论坛：“农民工女儿被清理出校 室外站着听课 20 多天”、“三中全会公告带给农民兄弟什么好消息？”；

凯迪-猫眼看人论坛：“是谁，在叫嚣农民土地私有化？！”；

北大未名 BBS：“据说北大农村学生只有 20%？”；“农民工调查归来感想”。

2、主帖或回帖内容与上述问题直接相关。共 4 个帖子：

新浪论坛：“你们都不吃橘子了，我们来年吃什么？”、“惊人的误解：小岗村人历来不会种地？”、“晒晒我代课二十二年的工资表，我不嫌丢人你都嫌丢人”；

凯迪-猫眼看人论坛：“大学生发起“吃一个桔子，少一份心酸”活动”。

3、在非直接相关的帖子中，网民身份或回复内容却与上述问题高度相关。共 1 个帖子：

新华网论坛：“为什么总有人怀念计划经济？”

1、农民是谁？——速写农民形象

要描述一个群体的形象，必然会通过不同类别、不同词性、不同感情色彩的语言符号来展开，在语言学中，正是“符号与符号的组合形成语言的结构”[2]，因此，本文此后进

行的分析都建立在分析词语使用的基础之上，通过并列、对立、集合各种类型的词汇，来折射网民的意义表达结构，来再现网络舆论中的“农民”。

首先，当网民讨论时，对农民形象的描绘正是从代词、称谓名词和形容词直接开始，这也是本文解析农民形象的起点。使用什么样的代词和称谓名词意味着农民与发言者处于什么样的关系，而使用什么样的形容性则对应着发言者对农民的直接刻画。

1.1 对农民的认同

表 1：	代词和称谓名词	形容性和形容词名词
①	农民兄弟站在窗外的闺女 农民老哥 农民子弟兵 衣食父母 农人子女	穷人的孩子老实的农夫 量大而无权的弱势群体苦 贫穷
②	佃农农民工 无产无产阶级 雇农农民兄弟 广大人民群众劳动者	城镇浮世者穷人 充满生命力的农民苦 黑暗可怜 可悲惨 遭罪中国最穷最底层的人
③	自耕农富农 工人兄弟	受害者短见 笨好欺负 无辜冤 苦难肥肉 赤裸裸的弱肉强食
④	基层	
⑤	老百姓你们 人家农民我们的桔农 我们的农民农民兄弟 农民大歌大嫂小农 农民伯伯我的父老兄弟 老乡	无良果农最老实 受伤的惨 无辜者受害 可怜最低层 辛苦较贫困 惨不忍睹最可怜 憨厚最脆弱 同是天涯沦落人永远苦的农民 勤劳质朴
⑥	农民小岗村农民	好吃懒做不劳动 不思进取依靠施舍过日子 懒惰 懒汉 画皮 伪装 假 自私自利人心涣散的小山村 卑劣的 可笑的 无耻的无知愚蠢 信口雌黄败家子们
⑦	（无明显指向）	（无明显指向）
⑧	农民兄弟	辛苦贫穷 富的流油弱势群体 不容易委屈 无奈

⑨	兄弟我们农民	弱势群体底层教师 下面的人民贫民社会主义社会的阴暗角落低人一等
⑩	他们包身工	穷惨 仇恨的种子社会最底层

1.1.1 代词的使用

表 1 中列出了样本各帖中的网民在谈到农民群体时所使用的代词和称谓名词，不同的代词与称谓反映了发言者对农民群体不同的身份认同，站在网民的立场上，怎么称呼农民，意味着表明农民和自己有什么关系，进而间接地解释了在他们的认知中农民是谁。

在网民自觉或不自觉的对话和争论中，农民忽而是“我们的农民”，忽而是相对具有距离感的“你们”或“他们”，“我们”、“你们”和“他们”这三组代词在不同的语境下轮替出现。根据帖子的不同内容和价值取向，网民对代词的使用出现了明显的分野。

在反映农民群体弱势处境的相关帖子里，例如：“①农民工女儿被清理出校 室外站着听课 20 多天、⑨晒晒我代课二十二年的工资表，我不嫌丢人你都嫌丢人”，网民较为普遍地使用代词“我们”，如“我们农民都喝西北风过日子了没见国家给我们什么”。

而在反映有争议性的农业问题的相关帖子里，例如：“⑤你们都不吃橘子了，我们来年吃什么？”，网民使用的代词则会随着观点和立场的不同，在“我们”、“你们”、“他们”之间游移盘桓，失去统一的倾向，如“我们也很愿意帮你们”、“很同情我们勤劳质朴的农民”、“希望你们果农们能加强防治这些问题”等等。

由此可见，在网络论坛中，网民并没有形成对农民的一致认同。农民是“自己人”，又是“他者”，既和自己的立场与情感息息相关，又在具体事件和利益纠葛中被划清界限，当面对的是一种普遍性的农村困境时，农民是“我们”，是社会成员的一部分，但同时又是“你们”，是发言者满怀同情、希望帮助的对象，而当面对关于农民或农村的负面消息时，农民是“你们”，是“他们”，是“我们”的对方、利益的另一端，是被客体化

的言说对象。因此，网民在对农民的认同上，陷入了一种“沟通与疏离、亲近与隔阂的矛盾情境”[3]，网民在情感上基本认同于农民，在发言立场上也保持了对农民的偏向，但在部分情形下，网民仍然把农民当成需要帮助或批判的对象，并未完全摆脱对于农民的客体化运作。

1.1.2 称谓名词的使用

相比起代词使用的分野，在称谓名词的使用上，显现出了更清晰的统一特征。如下：

1、“农民”一词常与表征亲戚关系的称谓名词连缀在一起，如：父老乡亲、大哥大嫂、伯伯、闺女、老哥、老乡等；

这种把两类称谓名词组合起来、拼贴使用的情况十分普遍，构成许多称呼农民时的并列短语，这种语法结构反映出网民至少在语言表达上对农民怀有亲切感，愿意把农民当成自家人、亲人，纵然是“他者”，也含有亲缘性，更确切地说是“内部的他者”。当然，这其中也隐含着现代人的宗族意识与怀乡情结，老乡、父老乡亲、闺女等不太现代的说法一方面是网民对乡村生活和文化传统的象征性留恋，带着强烈的怀旧气息，另一方面也间接地意味着在网民的潜意识里，农民是土气的、不时髦的，是活在过去与传统之中的前现代人群。

2、“农民”一词常被自然地置换或联系为佃农、农民工、雇农、包身工等外延更窄的类别，极少的情况下会出现富农这样的字眼，或者，被直接归纳为无产、无产阶级等内涵更广的群体；

这种习惯性的置换、联系和归类实际上也隐含着网民对农民的认知或偏见，条件反射式的把农民的形象固定化，在网民看来，农民就是无产的、被雇佣的、在城市寄居打工的，这个在使用称谓名词时所浮现的的词义约等式也与下面要详细讨论的农民特征紧密联系了起来。

1.2 农民群体的特征——描述性形容词的使用

表 1 还列举了在各帖中网民形容农民群体时所用的形容词和名词，这个词语集合像一组画笔，直接对应着网民对农民群体各个层面的特征的描述，稍作归类总结，就不难发现，在网络论坛中，网民通过不同的帖子、不同的观点，从不同的维度和倾向勾勒了对农民的定型化想象，速写出一张“农民”的简笔画。

1、拮据困难的物质生活；贫穷、贫困、辛苦、苦等形容词被大量使用，反复确认农民在经济和生活上都十分不理想，既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又没有得到足够的报酬，而“富”的形容词仅出现了一次，而且还颇具讽刺意味，是网民在质疑橘农“富得流油”，因而根本不需要帮助；

2、低下脆弱的社会地位；可怜、委屈、无奈、无辜、受伤、遭罪、脆弱、好欺负、惨不忍睹等悲剧性词汇大量出现，总体上反映出在网民的评价体系中，农民毫无疑问地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居于“下面”，是绝对的弱势群体，而另一种更富有感情色彩的表达则认为农村是“社会的阴暗角落”，那里孕育着“复仇的种子”；

3、敦厚勤劳的性格特征；老实、憨厚、勤劳、朴实、有生命力等词直接描绘出大部分网民心目中典型的农民性格，与老乡、父老乡亲等称谓名词的使用一样，充满了乡村品格的认可和追忆；

4、懒惰愚昧的负面形象。与前三类话语截然相反的是，在有关橘子、小岗村等争议性话题的讨论中，尤其是当网民意见倾向于对农民的质疑甚至批判时，网民使用的形容词一反常态，绝口不提温情，显示出了一种针砭时弊的批判力和不留情面的谴责，如无良、好吃懒做、不劳动、不思进取、懒惰、无耻、丢人、可耻等形容词。这种反差显影了网民心中隐藏的一句潜台词：不好好种地的农民就不是好兄弟。网民默认了农民目前“贫困”的物质生活和“可怜”的社会状况，并把这些弱势特征自然化、习惯化，成为一种惯例和

成规，当农民生产的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或农民不专心种地时，便会被迅速地指认为不务正业、没有道德。

另外，短见、无知愚蠢、信口雌黄、自私自利、人心涣散、卑劣、可笑等负面词汇几乎可以和第 3 类形容词直接对应起来，作为一组“一体两面”的参照系，可以被分别做感情色彩截然不同的两种解读，“老实”、憨厚”对应着“无知愚蠢”，“勤劳朴实”对应着“自私”、“涣散”，同样的意向可以被表述和理解为褒义，也可以被表述和理解为贬义。于是，农民及其生活方式可能被寄托着对传统、单纯、素朴的怀旧，也可能蕴含着对农村的落后和农民的愚昧展开的厌弃和不屑。

由此，网络论坛中已经既成了一种描写农民刻板形象的话语体系，即：辛苦劳作、贫穷生活、处境可怜、性格憨厚，圈定了一个典型农民的形象与生活，是乡村这个古老社会的落后代表；而当出现了对农民的批评时，网民态度却又落入了另一个固定思维，而且是以既成的那套刻板话语体系作为衡量标准和评价体系，去打量和评判具体事件中的农民是否典型、是否本分、是否符合农民的角色定位，而这，又形成了另一重话语空间，即对农民的定型化批评。这一正一负、一褒一贬的两极用语，从而构成了双重定型化想象，其间潜伏着一条最基本的线索，那便是，网络舆论中的农民形象充分地具有弱势群体的特征，处于而且必要的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而“弱势群体首先不是在数量上占少数的群体，弱势化是一种属性，一种政治和伦理属性。”[4]

刻板印象作为殖民话语的一种，它的重要特征是在“他性”的意识形态构建上对概念的固化，这种“他性”也可以有效地解释网民对农民的描写。对网民而言，农民栖息在一个不为现代化所触及的田园世界，勤劳、简朴等过去时代的民族品性，依然留存在他们身上，换句话说，“农民就是农业/农村文化的原教旨主义者”[5]，他们既是值得尊重的食物种植者、最顺从的劳动者，同时，他们并不天然地无害，而是隐含着某种落后的隐忧。

2、农民怎么了？——描述农民境遇

从各帖子文本中摘录出来的形容词，粗线条地描摹了农民形象，较为宽泛地总结了农民群体的各方面特征，而有了轮廓之后，接下来可以涂抹更多的细部、填充更多的色彩，

从而更加丰满地描述农民的境遇，在网络舆论中反映出与农民相关的更繁复的利益关系和情感图谱。

2.1 农民所受的压制性力量——成组的对立概念 二元对立的叙述结构

表 2：指责对象、对立概念的名词集合	
①	学校城里人 政府老师 教育局局长校长 权贵精英们 官老爷大夫
②	地主城里 乡镇一级权力城市 “新市民”精英 专家
③	政府资产阶级 地主城里人 官方地方豪强 村官当局 既得利益者城市的国土局公务员和农村的村委会领导班子 官府和村长一族 强势者以及富有者
④	精英富人 巨富（浙江那边）有钱有势的人 右派 精英 黄鼠狼
⑤	城里人政府 权威部门 ZF（政府）部门 移动、联通和电视台 网络媒体
⑥	小岗村农民剥削者 我党国家 政策恶霸 贪污腐败的人走资派 精英
⑦	（观点讨论，无明显指向）
⑧	领导公务员 国家学生
⑨	决定给你发多少工资的人所谓的公务员官员 政府官员 所谓的官员该县教育局长 上面政府 地方政府 国家教育局 某地官府 贪官 污吏 国家政策 学校
⑩	政府组织 阶级 tg（土共） 统治者精英 文人知识分子 专业人士专家砖家学生

从表 2 中可以看到，当网民谈及农民问题时，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成组的对立概念不断出现，二元对立的叙述结构一再复沓，这种结构又映射出网络舆论中农民的被动性社会位置。“对于‘对立’关系的双方，要给予对方‘对立的’意义。在很多情况下，这种给予意义的伴随着强烈的评价色彩”[6]。在对每一个话题的争论中，网民总是把矛头明确地指向其他社会阶层、利益团体或职业类型，在比较中演绎出农民的弱势地位，尽管具体的指责对象并不尽相同，但总是没有摆脱这种对立与矛盾的话语结构。而且，从指责内容和情感走向上来看，网民不仅把造成农民悲惨境地的原因都归结在此类对象上，还严词相向、大力声讨。

2.1.1 官方 vs 农民

这一层的对立关系有两个层面。首先，网民把造成各种农民问题的根源归于国家、政府、当局、政策、统治者等统制性整体性的力量，可以称之为宏观层面的官方，网民甚至还使用“zf”、“tg”等汉语拼音缩写来代替“政府”和“土共”，俨然成为一种典型的网络语言的使用常规；其次是微观层面的官方，一部分网民在讨论中把宏观的官方具象化为官员、公务员、官老爷、领导、村官、贪污腐败的人、权贵、大夫（历史官阶的类比）等政府公职人员，一部分网民因为具体事件的原委而指责更加细化的组织机构，如乡镇一级权力机关、村委会、权威部门等。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官方的力量都常常是网民最先涉及的指责对象，也是出现最为频繁和普遍的一类，在许多议题中，这一系列的官方代表都是作为一个负面的概念集合，充满了对农民的压制力和腐朽性，成为网络舆论的箭靶。

2.1.2 富人　vs 农民

前面一组对立关系更多的是从政治的视角切入，而这一组则是按照经济状况而展开的划分。第一类，沿袭城乡二元体制，网络论坛中自然地陈列出两组常规矛盾：城市与农村、城里人和农民，即使在与城乡差异无直接关联的话题中，也会有网民以此为话柄攻击富裕而无良的城里人，并表达对处于低位的农民的同情心；另一类是泛化的富人，例如富人、巨富、有钱有势的人、既得利益者等称呼都属于此类，也有网民使用近代史上的相似名词，如地主、地方豪强、剥削者、恶霸，以此来隐喻现时的农民并未走出地主时期的阴影，更有人上升到两种制度的对弈，把那些伤害农民利益的人指称为资产阶级、走资派、黄鼠狼。

2.1.3 具体的强势力量 vs 农民

联系各帖中具体事件的不同情形，可以归纳出备受网民指摘的另一个类型——具体的相对强势力量，这一类对立概念所标示的群体比较庞杂广泛，但基本上都是各个话题中的相对强者，或是享有社会权力的大企业大机构、或是各种组织的领导、或是依附于某机构

体制内的工作人员，例如：老师、教育局局长、校长、国土局、移动、联通、电视台、网络、媒体等等，从而与被伤害的农民构成一组清晰的二元叙事结构。

2.1.4 文化精英 vs 农民

文化意义上的精英与既得利益者也是受到网络舆论普遍性谴责的一个群落，因其受谴责的方式和原因与上述类型有较大区别，因而将在第三部分进行论述。

2.2 农民所处的压抑性地位——被动性动词的使用

当概念被比较、群体被对立的时候，一个连带效果是动词的使用。作为对上述二元对立的叙述策略的一种延续，当网民在表述站在对立面的诸多集团和个人是如何影响农民群体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极富强烈的对抗性和侵略性的动词集合，如表 3 所示：

表 3：被动性动词集合
开刀鼓吹 骗抢 赶强权抢夺 连根拔除销赃 抢劫宰割 强拆强流 抢夺损害 缺失坑 瓜分逼 伤害剥削 压迫强迫 侵略犯罪

坑蒙拐骗、烧杀抢劫，此类动词一再出现在网民对农民境遇的描述中，以此来形象化地说明各种对立力量是如何损害农民的生产与生活权益。这些具体的略带戏剧性夸张的动词和动作，对农民而言都是被动性的，彰显了受害者的地位，甚至还带着浓重的阶级斗争的色彩；帖子中还常出现用“强”字修饰的动词，如强拆、强流、强迫等，又再一次强调了网络论坛中农民叙事的二元对立，从而展示了一种动态的、具有方向性的权力关系。

综上，网民通过在网络论坛的聊天、讨论，提及了诸多与农民相对立的概念，并据此指认出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压制性力量，他们把农民在具体议题中的难为处境归咎于此，把农民在社会整体上的悲剧性地位和作用归因于此。换句话说，在网络舆论之中，农民的苦难及其原因正是通过各种形态的二元对立的概念来讲述的。“一如布迪厄所言，人们习惯用好坏、高低、雅俗、贵贱等二元分类方式来认识社会现象，所谓的‘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往往是通过这种方法来实现的。这种分类方式体现了特定社会秩序的存在并建构着这种秩序，彰显了微观权力中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矛盾关系”[7]。

这种话语结构上的二元对立正是源自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1958 年 1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91 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奠定了中国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二元户籍模式的基础，开始实行“农业户口（农民）”与“非农业户口（市民）”的特殊的身份划分，有人将这种身份划分戏唬为“一个国家两种公民”。通过改革前后中国社会现实的对比，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有学者进一步将城乡二元结构区分为“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和“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当前，这两种二元结构叠加在一起，体现了社会结构的断裂或“断裂社会”的存在。[8]

“这种制度性的城乡差异，将中国农民置于近乎二等公民的境地”[9]。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旧有的城乡分异的机制催生了二元分化的话语图式，而二元对立的话语图式又在网络舆论的空间中建构了新的城乡景观，于是，现实和舆论这两个层面的内在结构才表现得如此相似，话语上的“二元结构”才得以建构和呈现。

2.3 网民对农民境遇的立场和态度——表达感情色彩的词语使用

既然构成了上述那样一种二元对立的弱势局面，便引出下一个问题：网民对农民境遇究竟怀抱怎样的态度？其实，在前两个部分的论述中，网友的主要倾向已经呼之欲出，网民们的目光和视角也逐渐清晰了起来。表 4 罗列了网民在言谈中使用的直接表达对农民的感情、态度和立场的相关词语，在前两部分相对间接的表态之后，进一步揭示其背后的心理机制，直抒网民的胸臆。

表 4：感情色彩用词
心酸悲哀 同情难过 想哭叹息 继续哭泣担忧 深感同情担心 多多理解心疼 心酸假仁假义 丧尽天良不冷血
声援帮助 帮帮忙 鼓励支持 祈祷祝福无能为力
可恶丢人 可耻

同情、可怜等词语在帖子中出现的频率极高，这也简洁地点出了网友的主流意见，绝大多数网友的发言都选择了这种感同身受的立场，而在语言文本上饱含情感的主流之下，主要有两种情感投射的方式：一是偏情感和偏道义的态度，即对农民的悲惨境遇表现出设身处地式的理解和同情，甚至心痛和难过，还有流泪、哭泣等伤感的动词，这一类基本上都属于网民心理层面的状态，是他们对农民群体投去的深情一瞥；二是行动或偏行动的态度，是在心理状态的基础上，具有更多的表示和行动，或多或少地向困境中农民表示鼓励、送出祝福、伸出援手，正如一位网民所写的“关心果农，从我做起”。

以上两种态度在基本立场上没有太大区别，情感基调上都是维持着对农民境遇的同情，基本线索就是对公平、平等以及和谐的呼唤，对歧视与不公表达愤慨。

而在少数帖子中出现了部分对农民态度颇为恶劣的评价，主要批判的是柑橘事件中不负责任的橘农和小岗村“不务正业”的农夫，措辞的激烈程度也丝毫并不亚于此前饱满的怜惜之情。这种矛盾态度在前文有关形容词使用的论述中已经涉及，不再赘述。

3、农民怎么办？——对农民问题的想象性解决

至此，在各网络论坛的农民话题中，已经呈现出一种有苦难言、悲天悯人的话语氛围，当然也伴随着质疑与谴责的声音。建立在事实描述的基础之上，网民不仅在情感上有所表达，而且还偶有对解决农民问题提出或戏谑或严肃的建议方案，就好像是医生诊断出症结之后，都要开出一张处方，抓药打针，治疗患者的疾病。但由于网络舆论并不直接对应着社会实践，因而，在这个平台上形成的方案只能是想象性的。

3.1 解决农民问题的利益相关方——另一组建议性对立概念的使用

表 2 中罗列的大量对立概念属于被网民指责的对象，而表 5（下表）中集合的这组概念仍然延续了二元对立的结构，但却是出现在网民开药方的语境之中，当网民对农民问题提出建议和期待时，常常寄希望于这些对象，认为这些组织和个人必须负起责任，出面解决问题，或是建议农民诉诸于以下对象，以之来维护、追讨自己的利益。总而言之，表中各项都是被网民作为改善农民境遇的可能途径。

表 5：建议、期待对象的名词集合	
①	国家法律 《义务教育法》教育主管部门 出台文件的老爷们
②	保山胡主席 党中央
③	政府政策 法律制度
⑤	国家国家相关部门 中央领导 官员 媒体 领导
⑥	有关部门国家 怀念对象：毛泽东人民公社 集体经济
⑦	（观点讨论，无明显指向）
⑧	领导公务员 国家
⑨	祖国国家的法律 总理《劳动法》 《教师法》皇帝（山高皇帝远）咱们的父母官们 胡锦涛 温家宝

两组概念相比较而言，有许多饶有意味的变化，从中可以显示出当网民指出了问题和错误之后，付诸到实践解决的层面时会有其他的寄托。

1、一部分概念完全重合，例如：国家、政府、政策、有关部门、教育主管部门、领导 公务员等等，意在呼吁那些此前受到谴责的机构和个人有所改进，做出更正、补偿和彻底改观，如有网民说道：“我相信国家会帮助你的”，此时，网民已经放弃了一个旧制度旧国家的消极形象，而是重新树立了“作为大救星的国家形象认识”[10]；

2、一部分属于同类概念，但在内涵或外延上有了新的变化，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对具体领导人的呼唤，前文论及了宏观和微观上的官方，都是一种对农民的压制性力量，批评政府、国家和官员的不作为，而当网民寻求相关解决的时候，却又把期望托付给了更有指向性的最高领导人，比如胡主席、温总理、中央领导、出台文件的老爷们等等，如有网民说道：“希望总理也能知道这样的事情”，还有网民写了一封“给胡锦涛、温家宝的一封信”，认为他们应该站出来改变局面；

3、另一个类别是表 2 中没有涉及的，却在网民给出的解决方案中频繁出现，那就是法律，网民还列举出数部具体的法律，如《义务教育法》、《劳动法》、《就业法》等，许多网友发出了这样的质问：“《教师法》还有法律效力吗？”，认为解决农民问题必须要拿起法律的利剑，这是一条最安全、最可靠的出路。

3.2 农民如何付诸行动——主动性动词的使用

如前文所论述，农民的形象和处境都是由各种对立关系的话语建构起来的，而在提出建议和解决的时候，也是这种对立关系的继续。作为对表 3 所列被动性动词的对照和回应，当网民讨论农民应该如何自我保护的时候，出现了一组主动性的动词，与表 3 一样，表 6 中的这组动词也充满了对抗性，既有革命、打倒、反抗等激烈的冲突动作，也有移居火星等表征逃避的玩笑说法。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而对于农民这一在错综复杂的压制性力量之下生存的社会阶层，如果要为自己寻求出路，似乎就只能是寻求其存在状态和社会位置的根本改变。当农民无法在常态的经济、社会地位提升中分享太多的成果，那么就只有革命，才能在一夜之间完成“翻身”。在网民给出的答案中不难看出，这个主动性动词集合都是在短时间内完成，没有过渡，没有渐变，而是一种骤变的仪式。“这样一个来自外部的强大力量带给农民的，远远超出他们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努力的结果”[11]。

表 6：主动性动词
保卫反抗 革命改良 移居火星坑儒 打倒

这种革命性的叙事略带夸张，却又再一次印证了网络舆论中的农民群体身处与巨大的社会裂痕中，如果要有所改变，似乎就只能真刀真枪地闹起革命，才能掘进出一条自我救赎的暴烈道路。

3.3 呼唤农民的主体性——文化精英 vs 农民

第一部分提到了网络舆论中文化精英与农民的对立，之所以说这一组对立与其他对立关系有所区别，是因为网民并不是指责这个群体是农民问题的“罪人”，而是在讨论农民的出路时才提及文化精英这个群体，认为他们是过程中的麻烦制造者。这类名词主要包括：文人、知识分子、专业人士、专家、砖家、学生等等，在网民的言论中，文化精英都是“死抱着书本上的‘条条’和‘框框’，脱离中国农村的实际，主观臆断，胡乱假设，随意推断，名曰替农民着想，实为不愿意放弃特权集团的利益”，还有人冷嘲热讽道：“嘴不痒还叫知识分子吗”，显示出了对这一序列的反感和排斥。即使在北大未名 bbs 这样主要由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和老师组成的论坛中，网民也通过调侃对文化精英的学究气表达了鄙视，这一类别中最严重的提法居然也出自未名 bbs，有网民在回帖中直接写道：“支持坑儒”。

回到具体文本中可以发现，网民们不但极力反对任何压制性力量，还反对其他集团出面指手画脚。在网民的话语中，文化精英充其量算是“为农民代言”者，并不真正熟悉农民、了解农民，更无法分享对农民的认同，有人写道：“压根儿就不是关心农民，你没看出这年月的专家就是忽悠人”。由此可见，拒绝文化精英介入解决农民问题，无疑是对这一群体的不认可和不信任，而其背后的逻辑仍然认为农民的问题只能由农民自己办，有网友说：“我觉得，改与不改是不必争议的，定肯要改，但是改之前，先让农民把话讲出来，问问他们愿意怎么改”，这反映出网络舆论对农民主体性的呼唤，也是网民们给出的想象性解决方案中一条重要线索——“让农民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这才是最重要的。”

4、农民在哪里？——参与建构网络舆论的真正农民

在 10 个样本帖子数以千计的回帖量中，明确表示自己是农民或有农村背景的回帖数小于 100，当然并不能排除农民发帖但未直接表明身份的情况，也不能排除表明假身份的

可能性，但这个粗略的比率本身依然可以说明网络舆论中真正来自农民群体的声音十分有限。

这些表明身份或背景的帖子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1、直接表明农民身份，并且现仍在农村务农；

如：“我是石门人，今年我家的桔子只卖了 1 毛一斤”、“ 我是种田的，如果菜有一两条蛆仔这是最正常不过的咯！”、“河北省邯郸市魏县，月工资 131 元，我也是代课教师”等等。

2、表明自己出身农村，或曾经有过农村生活经历；

如：“我是湖北农村出来的孩子”、“我小时在农村，那时山上的梯田用抽水机灌溉”、“我也是农民的孩子但是我也吃不下有蛆的橘子啊”、“我是农村的，我们当时小学一个班 42 人，现在有三人读大学”、“我 1976 年高中毕业回生产队种田，在生产队干过记分员”、“我家在农村，我的学生时代每到假期经常参加生产队的劳动”等等。

3、表明自己有亲戚朋友曾经或正在农村务农。

如：“我一哥们他们家就是石门的”、“本人不是农民，但还有数以百计的亲戚朋友是农民”、“我不少小学同学现在就是农民工”、“我的舅舅当年当工人时响应国家号召，自愿回乡”、“刚才我的在乡下的叔叔来电话”。

以上三种情况都较为集中地在橘农和代课教师两个话题中出现，整体看来，亮出身份或背景的网民的观点和立场斗都非常一致，并且分享着高度雷同的一种自报家门式的发言

模式——“我是……”、“我来自……”。通过这种形式，有的网民表明自己也是橘农或代课教师，并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以示支持，而有的网民借由过去的或周围人的经验，间接地认同和强化农民的弱势地位，并直接替农民群体说话、出气。

当然，这些网民的观点并不是完全统一的，其内部也出现了极少的不同意见，也存在怀疑和顾虑，还有人明确以自己的农村成长背景为理由，转而反驳揭露乡村代课教师工资太低的发帖人，如“我也是偏远家村来的，你蒙不了人”。

由此，在各大网络论坛的帖子里，终于找到了发言的农民，尽管数量有限，但至少可以直接听到他们是以何种姿态参与讨论，又是如何进行自我言说和自我辩护的。但是否可以由此推断出现实生活中的农民群体正在逐渐进入网络论的话语空间，并日益发挥着作用呢？恐怕还为时尚早。

首先，农民直接参与网络舆论的一个重要形式是代言，即被农民的亲戚朋友等群体代表在网络论坛上发言，这其实又是一种被他人言说的状态，只不过在地域或情感上拥有了更大的接近性而已。就其本质，仍然没有获得完全、充分的主体性地位。

其次，在此类回帖中，有农村背景的发言群体不仅呈现为一种既有现象，更呈现为一种辩论策略，网民通过亮出这一重身份和背景，来获取对特定议题的发言权，并以亲身经历作为强有力的论证，为自己的言论带来合法性，辩驳或捍卫某个观点。这样一来，农民身份、农村背景极易被冒充，成为一种工具性的手段，而其目的不过是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够更具说服力。

最后，尽管此类回帖数目已经很少，但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一部分网民对发帖人身份的真实性表达了强烈的怀疑。因为观点上的不同，有人认为农民怎么会有闲心闲钱来上网，如在“⑨晒晒我代课二十二年的工资表，我不嫌丢人你都嫌丢人”一帖中，有网民责问道：“小哥，你的工资是不高，但是那来的闲钱上网玩啊，没有的阿事不要拿来瞎忽悠败坏教师的名声啊”；也有人认为怎么会有农民出来帮政府说好话，如在“⑦为什么总有人怀念计划经济？”一帖的讨论中，一位名叫 lolo2 的网民自称是富裕了的农民，因此表

达了对政府的感激，这与其他网民的主流意见相悖，即刻遭到了群起而攻之，许多网民纷纷质疑其身份的真实性，认为其是“假冒农民骗子”，而 lolo2 也逐一回应，还多次发照片，出示各种证据，以确认自己的身份，但终究因其言论“太河蟹”，而没有取得众人的认可。可见，即使在网络舆论内部，也对农民的进入保持着高度的敏锐和警觉，这样的后果一方面的确过滤了虚假身份和回帖的可信度，但另一方面也打击了真正进入言论场域的农民，他们的话语极有可能再度被湮没、被否认、被拒绝。“由于农民文化主体性地位的缺失，农民问题的提出和解答就带有相当的片面性”[12]。

结论

通过对四个论坛十个帖子文本的话语分析，已经渐次回答了开篇提出的四个问题：农民是谁？农民怎么了？农民怎么办？农民在哪里？

首先，从网民使用的代词、称谓名词中可以看出，网民们对于农民的身份认同是复杂和多面的，他们的立场不断摇摆，农民有时是我们的“父老乡亲”，有时又是“他者”。从网民使用的描述性形容词来看，充满了一正一负、一褒一贬的两极用语，网络论坛中的农民形象具有拮据困难的物质生活、低下脆弱的社会地位、敦厚勤劳的性格特征、懒惰愚昧的负面形象这四个特点，网民对农民的态度陷入了一种“沟通与疏离、亲近与隔阂的矛盾情境”。

第二，网民们成组地列举了诸多与农民相对立的概念，用二元对立的叙述结构指认出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对农民群体的压制性力量，如：官方、富人、文化精英和其他具体的强势力量，再现了加诸在农民群体上的繁冗的权力网络。网民用以表达感情色彩的词汇体现了他们在情感基调上维持了对农民境遇的同情、对歧视与不公表达愤慨以及对公平、平等、和谐的呼唤，但其间也不乏对农民恶语相向的矛盾态度。

第三，当网民试图为农民找出一条想象性的解决途径时，他们同样诉诸于此前的诸多对立概念，但其中发生了许多微妙的变化，比如网民在严厉批判政府的同时，却又对具体的领导人充满期待。而大量被使用的激烈的对抗性动词又给农民在网络话语空间中的突围

之路蒙上了一层革命性的叙事色彩。当然，解决途径的最后还是落在了对农民的主体性的诉求之上。

最后，网络论坛中已经出现了以农民身份发言的情况，但其中大部分以“代言”的形式出现，而且常常被作为一种辩论策略，甚至遭到其他网民的严重怀疑。

在一系列的勾勒描摹之后，网络舆论中的农民问题并没有偏离刻板印象和话语权这两个母题，网民的话语空间中依然充满着对农民群体的定型化想象与话语权失落。但反观传统意义上大众媒介对农民的反映，网络舆论在对待农民时表现出了更大的善意，但问题真正的解决还远不止于此。

参考文献

[日]池上嘉彦著 张晓云译：《符号学入门》，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

叶蜚声 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陈成文：《社会弱者论 体制转换时期社会弱者的生活状况与社会支持》，北京，时事出版社， 1999

方晓红：《大众传媒与农村》，北京，中华书局，2002

孙立平：《断裂：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王彬：对农民的符号性表达与新农村建设——近年电影中关于青年农民的刻板印象，“十一五”与青少年发展研究报告——第二届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暨中国青少年研究会优秀论文集，2006

陈永国：弱势化：一种新的全球化——霍米•巴巴清华演讲，《国外理论动态》，2002 年第 8 期

郭于华 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中国学术》，2002 年第 4 期

王建民：社会转型中的象征二元结构：以农民工群体为中心的微观权力分析，《社会》2008 年第 2 期

卫夙瑾：大众传媒与农民话语权，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年 4 月

徐伟伟：刻板印象的生成机制研究一一以都市媒体中的河南集体形象为例，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年 3 月

贾冰：媒介农民形象——兼论媒介农民形象镜像中的政府形象，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年 4 月

丰帆：我国媒体对“农民工”报道的内容分析与话语探讨，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年 5 月



方晓红 贾冰：论《人民日报》“农民形象”塑造——兼议衡量媒介三农报道的一个重要指标，《新闻界》，2005年4月

陈开举：论中国传统文化对农民形象的他者化建构，《江汉论坛》，2007年8月

路俊卫：弱势群体与传媒“弱视”，《当代传播》，2004年6月

陈崇山：谁为农民说话——农村受众地位分析，《现代传播》，2003年第3期（总第122期）

吕尚彬 傅海：中国农民媒介认知研究的主要发现与结果分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61卷，第3期，2008年5月

卢迎安：重塑农民形象的思考，《当代传播》，2007年第3期

樊葵：当代信息传播中的传媒歧视，《当代传播》，2003年第5期

刘旭：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天涯》，2004年2期

周海涛：农民话语权的表达与传媒作为，《新闻界》，2004年3月

张文静 雷蕾 沈丽娟：媒介文本中再现对象的刻板形象的符号学分析，《科协论坛》，2008 年第 4 期

李晓红：批判话语分析理论与批判性语篇阅读，《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10 卷第 2 期，2007 年 6 月

---

[1] 选择依据：新华网发展论坛深水区是具有官方媒体背景、讨论政治经济等高端问题的论坛代表，同类型的还有人民网强国论坛；凯迪网络猫眼看人论坛是参与度高、议题广泛化、风格多元化的大众论坛代表，同类型的还有天涯社区等；新浪网新浪杂谈是依托于门户网站的交互式论坛频道，同类型的还有网易论坛、搜狐论坛等；北大未名 BBS 三角地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校园论坛，用户集中于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和老师，同类型的还有水木清华 BBS、南京大学小百合 BBS。经过实际操作和比较，主要从网站页面设计、数据提供等方面考虑，研究者从四类中各选择了一个可操行最高的论坛作为研究对象。

[2] 叶蜚声 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第 32 页

[3] 王建民：社会转型中的象征二元结构：以农民工群体为中心的微观权力分析，《社会》2008 年第 2 期

[4] 陈永国：弱势化：一种新的全球化——霍米•巴巴清华演讲，《国外理论动态》，2002 年第 8 期

[5] 王彬：对农民的符号性表达与新农村建设——近年电影中关于青年农民的刻板印象，“十一五”与青少年发展研究报告——第二届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暨中国青少年研究会优秀论文集，2006

[6] [日]池上嘉彦著 张晓云译：《符号学入门》，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第 167 页

[7] 王建民：社会转型中的象征二元结构：以农民工群体为中心的微观权力分析，《社会》2008 年第 2 期

[8] 孙立平：《断裂：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 14 页

[9] 卫夙瑾：大众传媒与农民话语权，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年 4 月

[10] 郭于华 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中国学术》，2002 年第 4 期

[11] 同上

[12] 王彬：对农民的符号性表达与新农村建设——近年电影中关于青年农民的刻板印象，“十一五”与青少年发展研究报告——第二届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暨中国青少年研究会优秀论文集，2006

（吴琦，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p=1022）

【听】

5-3 夜明猪：透过数据看真实的世界

“假如你不能学会从数据中分析出结论，你就关上了一扇了解真实世界的大门。特别是在这个混杂着伪文艺青年日日编织着商业谎言，准愤怒青年天天转发着时代的怒喊，学一点数据分析绝对让你更心平气和理性面对这个世界。”

假如你不能学会从数据中分析出结论，你就关上了一扇了解真实世界的大门。特别是在这个混杂着伪文艺青年日日编织着商业谎言，准愤怒青年天天转发着时代的怒喊，学一点数据分析绝对让你更心平气和理性面对这个世界。

我有一个女性朋友怀疑她的男朋友劈腿了，不爱她了。我告诉她可以花一周时间做两个统计，第一个统计是他不上班的时间有多少花在你这里了，第二个统计是他的钱都花在哪儿了？

大家知道，一个男人要是喜欢一个女人的话，最简单的判断标准不是他嘴上说了什么，或者他在床上有多卖力，而是肯为她花时间，肯为她花钱。

大凡一个男人这两点对你不错，你可以相信他对你的感情是值得信赖的，否则，他可能对你的确有好感，但是你知道的，好感不是爱情。

可我认识的很多女性朋友只需要用舌头就彻底可以被征服，她们会问苍天问大地为何当初他对我信誓旦旦，如今不闻不问。

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 Excel，输入数值，画一个折线图，横坐标是时间，纵坐标是每天短信数量，现在，他对你的感情，一目了然。

这就是数据分析的力量，数据冷冰冰，可是它不会撒谎。

再说说做时下流行的微博，我一个朋友告诉我某某某出书后粉丝暴涨，我去看了一下，果然暴涨，粉丝数已经破了 5 万，微博数过千，但是每条微博评论平均值不超过 2，这真是一个很二的数据。

2011 年 4 月 4 日 18 点 28 分，这真是一个神奇的日子，刘谦不小心按了一下手机，于是发了一个“。”号到新浪微博上，结果转发超过 600 次，评论超过 1600 次，这条微博还在，你们可以查到。

嗯，我的意思一个真正拥有 5 万粉丝的人，就是发个问号，就会有粉丝会问：“你？什么？”

我可以这样解释一下这个事情：这个世界寂寞的人很多，但是真正关注你的人很少，所以每次粉丝回复我，我都尽量抽空回@一下，感谢在 70 亿地球人中你曾经为我停留过那么一秒来关注，这个桥段无关数据分析，这是文艺性思考，咱们感动得哗啦哗啦的，其实人很容易被自己的善良感动而已。

假如你了解数据分析的话，世界就没有那么让人愉快。

在湖北武汉新浪名人微博前 10 名中，第一名是后来居上的李娜，第二名是一位美容减肥伙伴，将近 100 万粉丝，说的都是女性热门话题，微博转发很少过 200 次，第三名是平安荆楚，微博粉丝近 80 万，微博转发很少过 20 次，第四名美容减肥馆，微博粉丝近 60 万，微博转发很少过 100 次，第五名是归元隆印，粉丝近 50 万，微博有一些好段子，

但转发依然不太给力，到是经常可以破 150 次，甚至更高。对于宗教界人士，我不能乱讲，但是某代表公权力的微博，买粉这事数据的答案是肯定的。

我觉得这个事吧，这么说吧，买白粉肯定是犯法的，买粉丝基本是犯贱的。

假如你这样分析下去，你就开始做数据分析里面的样本取样和规律统计的功课，要统计出规律，你就得设置一些考核对比的指标，这就需要你了解你所在行业的业务特点来设计合理的管控指标，假如我们用微博平均转发数和粉丝数相除，我们大概可以了解一个人微博段子的质量，假如我们用微博平均评论数和粉丝数相除，我们大概可以了解一个人微博粉丝的互动度。

这两个数据好，微博大概可以有一点点比别人更好的商业价值，回头我们再看微博营销的很多团队，他们的功课除了刷粉还是刷粉，我最近被骚扰的刷粉团队头像写的是 8 元钱一千粉，这意味着你只需要花 130 元钱，就可以在粉丝数量上轻易打败我，@秋叶语录，已经快 2 年了，粉丝数也不过区区一万六不到。

这个世界很多人很二，他们只需要一个绝对值就可以被欺骗，当然这世界很多人比较二，他们只需要一个平均值就可以被欺骗。最后这世界很多人有点二，他们只需要一个表现为洋名词的概念就可以被欺骗，比如 CPI 神马的。

其实我不反感别人欺骗我，我只是担心我的理性比较容易被数据强奸或者顺奸。其实这个世界上最悲惨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在欺骗你，而是他直接上来就强拆你。

如果你对这个世界还有一点点好奇心，如果你还希望拥有分析事物完整框架的思考能力，如果你希望在职场竞争中除了以情动人还能以理服人，你应该学一点数据分析。



是菜鸟不要紧，因为我的朋友们已经为你们准备了这本菜鸟入门书，我看过，很好，生动活泼，浅显易懂，但是绝不是看看就会，你得按书上的思维好好练习，熟能生巧，欲速则不达。

书作者送了我一本，刚好我也拍了一本，我的小舅子在 IT 公司工作，要进行 CMM 四级评估了，他说项目管理中的工作量评估再也不能用原来的那种 1+1=2 的初级算术式理解了，要做抽样调查和数据挖掘才能满足评估条件。

于是他很高兴地拿走《谁说菜鸟不会数据分析》，我相信他过三个月一定不会是菜鸟。

至于我的一个爱好，依然还是那个经常用伪文艺的思维写着冷冰冰的理科书书评的宅男。

（夜明猪，1510 网友。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p=1017）



【道】

5-4 熊培云：为什么需要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



“像那个时代孤独的先知一样，董时进所预言的许多事情都一一应验。我知道董时进并不是什么先知，他只是一个自始至终保持着其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以一种特 殊的方式告诉中国社会为什么需要具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他所在的时代忽略了他，并且受到了这种忽略的惩罚，而历史以一个残酷的玩笑记载了他的荣耀，以及哀伤。”

有一次聊天，柴静突然问我：难道你没有那么一天，如梦方醒，意识到现实生活和我们小时候通过教科书相信的美好社会不一样？我说没有啊，因为我很少通过教科书相信什么，我更相信生活。

拜改革开放之所赐，今日民众不再闭目塞听，大多能相对从容地正视本国体制的诸种弊端与不足，不再以一个笼统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来回避问题，这也是今日改革的动力或者民情之所在。在此，我想说明的是，自小生长在乡村，在中国的最底层，让我深知生活的艰辛，知道拂去时代的虚饰。从经验出发，这也是人类理性的开端。我对世界的判断并非来自课本上的说教，而是来自真实的生活，一些完全可以称得上是经验主义的东西。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也就是我读中学的时候，有件事开始让我一直耿耿于怀，那就是为什么我没有一张小时候的照片，而近现代历史上许多人物却有年少时的照片。这当然不是因为江南空气潮湿没有保存好，而是因为我生在农村没有机会拍照的缘故。此时，毛主席的头像却是四处放光。

是的，这个村子贫穷、落后，但为什么滞步不前？事实上在二十里外的县城，早在南昌起义之前便已经通了火车。由于年少无知，我还不知道追问中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走了怎样的弯路，但类似的经历让我对经验之外的说教与推理有了些免疫力。如果我正忍受着饥饿的煎熬，我是断不能通过天花乱坠的概念推理出自己拥有酒足饭饱的幸福的。

说到饥饿，我已经没有多少切身的记忆。母亲偶尔会说起我小时候如何营养不良，以及现在的小孩们如何油水足。不过，对于发生于五、六十年代的大饥荒，我从祖母和父辈那里还是了解了一些。据祖母说，她有个女儿便是因为营养不良夭折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亲十岁左右，每餐分到的口粮只有一两米，而大人都是二两米。由于吃不饱，父亲只好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去挖野菜，或者跟着爷爷去山里剐柚树皮充饥。这不是个好差事，因为许多树皮都被别人剐干净了。而这些替补食物，早先都是一些猪食。人吃起来，不是出现解手困难，就是肚子会疼。我的父母一直患有胃病，恐怕和这场大饥荒不无关系。

谈起当年的饥饿，母亲常常和我提起她之所以没有念完小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饿得头晕，书包都背不起”，后来索性不去了。事实上，此时江西的饥荒还不算最坏。而这场被称作“三年自然灾害”的灾害，死亡人数虽然民间有三千万或者四千万之争，但就官方公布的数字来看，至少也在千万之上。痛何如哉！极端的年代，人们甚至被剥夺了最卑微的自救的权利，要饭还要乞讨证，否则是“给社会主义抹黑”。不过，再严密的追堵，还是磨灭不了人们求生的意志。在我印象中，直到八十年代，仍然经常有来自安徽、河南甚至江苏等省的逃荒者到本村要饭。本村有位妇女，便是在六十年代初跟着她的母亲以及三个兄弟姐妹一起从江苏逃难而来的。

说起这场大灾荒的起因，村民似乎仍停留于重复当年官方的解释，一是因为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二是被苏联逼债。当然历史并非那么简单，几十年间，有心梳理历史或者不忘过去的人都知道，灾难的起因在于当时的内政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事实上，就在灾难发生的年份，中国还在向苏联出口粮食。

1755 年，当伏尔泰为里斯本大地震中死去的四万生命愤慨不已时，卢梭则回应道：发生灾难，错误不在大自然，因为不是大自然“把两万家庭聚集到六七层的楼房中”的。

卢梭接着说，假如居民散居开来或是以另外的方式居住，“那么地震的次日，我们会在 20 个不同地方看到他们高高兴兴地活着，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

我是在《饥荒与政治》一书中读到上述材料的，这大概也是有关“风险社会”的最早论述吧。作者西尔维·布吕内尔认为，把眼前的困难归咎于自然环境、所谓的人口过剩或者食物产量降低等因素，就像许多外部观察家所言（他们或无知，或仓促，或不怀善意），这实际上意味着在解释饥饿现象时无视政治因素在当今发挥着多么重要的决定作用。

而按现在的危机干预理论，饥荒的发生通常都会有前兆，比如食物储存逐渐枯竭；市场上的食品价格提高，出现替代品（可食用的野生植物、动物）；最健壮和最有才能的家庭成员忙着为留在原地的人找寻食物；有社会意义或象征意义的物品被变卖；用于生产的牲畜被杀等等。从食物匮乏到人口大量死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制止一场饥荒只需几个星期。若非政治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场饥荒会没有预警，又怎么会持续几年时间？毛泽东听说信阳死了许多人还不相信，以为是阶级敌人在造谣搞破坏。

春种秋收，大量守着农地的农民活活饿死，不得不说是 20 世纪最大的悲剧。他们有种粮食的义务，却没有获取粮食的权利。纵观全局，这次大灾荒之所以源于一连串事件：兴无灭资、强制农民集体化、大跃进、强征农民余粮等等，而最重要的一条是当时的社会反对意见已无立锥之地，这也是我在整理农学家董时进先生的相关资料时的一个最深感受。当政府或领袖开始统领一切，决定一切，丰富的社会被国家装进一个篮子，如卢梭所说的将所有人都“聚集到六七层的楼房中”的危机随时出现。

前文提到，董时进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曾经上万言书反对毛泽东主政的土改，并坚持认为土改只是“慷他人之慨”，并从逻辑上推断出“一旦田地社会化了，什么人也没有田地”。言路受阻后，1951 年继续在香港出版专业书籍，指出当年正在启动的农业集体化的种种弊端：

对于呼声甚高的“苏联经验”，董时进的批评是，“苏联的集体农场是否能算是成功，是否真比单体或家庭式的农场好（就有关农业生产及农民生活的各项条件而言），是另一个问题。但我确知道，世界上最好的农业和最富的农民，都不是在苏联，而是在所谓

资本主义国家。我也知道，苏联的农民一般都愿意成立独立的家庭农场，只是在政府的强迫下做了集体农场的场员。退一步说，即使承认苏联的集体农场有一部分的成功，然而也要知道，苏联是苏联，中国是中国，两者土地人口的情形，和历史的背境均判若天渊。”

与此同时，董时进更尖锐地指出，“这种制度（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完全是回复到封建和农奴制度，绝不是什么农民合作，扩大经营，提高效率的意思。我一向以为这个办法是要不得的，害处很大的。我预料将来惹出许多乱子，杀死及饿死许多人之后，终究还是要作罢的。我不懂主政的先生们，和高唱集体农场入会的先生们，何以如此胆大。自己对于农业有何研究及经验，对于家庭农场和集体农场有何比较的研究及经验（政府在短时间内办了少数几个农场，无论成绩如何，都是不配称经验的），竟敢把这关系国家命脉和几万万人民生活的农业经营制度，拿来当试验品！”

悲哀的是，像那个时代孤独的先知一样，董时进所预言的许多事情在后来都一一应验了。当然，我更知道董时进并不是什么先知，他只是一个自始至终保持着其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告诉我们中国社会为什么需要具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他是孤独的。他所在的时代忽略了他，并且受到了这种忽略的惩罚，而历史以一个残酷的玩笑记载了他的荣耀，以及哀伤。

（熊培云，《南风窗》驻欧洲记者，专栏作家。原文链接：http://news.ifeng.com/opinion/zhuanlan/xiongpeiyun/detail_2011_06/22/7174474_0.shtml）

5-5 刘瑜：公民觉醒

“我觉得中国现在很多所谓的消极公民，对积极公民有怨恨，因为积极公民的存在，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无力和逃避，所以对那些人反而特别苛刻，你是不是想出风头啊？想成名啊？你怎么这么喜欢暴露中国的黑暗面啊？这是我不喜欢看到的。至于你做你的消极公民，你不介意别人去做积极公民，那这个没什么，大家都 做自己爱做的事。”



一、公民觉醒与政治无能

记者（困困）：我想我和我认识的很多人都属于“我一代”。可在 2008 年之后，尤其是经历了地震，奥运等等之后，至今，大多数“我一代”或多或少主动被动地都关心起政治生活来。

刘瑜：你说的这个体验和我的观察很接近。最近大概三四年，中国年轻人当中，至少是都市年轻人当中，政治文化的变化挺明显的。以前如果你是个小白领，你得是个怪人才会去关注公共和时政话题。这几年有点形成一个浪潮：你不但可以去关心这些东西，而且关心这些东西还挺酷的。比如沙龙，书店讲座，网络论坛，或者办准民间杂志，感觉到有点新气象。

记者：不管它是不是酷，这算是公民觉醒吗？

刘瑜：我觉得关心公共事务是人的自然状态的一部分，只不过以前很长时间，我们的政治体制把这个东西给蒙蔽了。现在因为互联网，社会发展，全球化等等，被蒙蔽的东西被揭开了。实际上中国至少从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们大多是有清晰的政治意识和公共生活意识的，内容也许有变化，但是有公共意识这一点本身没有变过。真正的被蒙蔽是从 1990 年左右到 2005、2006 年左右，恰恰是你们这些 80 后成长的这些年。这就让你们误以为“不谈论政治”是一个自然状态，实际上那恰恰是一个不自然的状态。

中国的政治，1980 年代所有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避免文化大革命重演，90 年以后所有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避免天安门事件重演。所以政府有意无意地使这个社会去政治化。市场经济的崛起，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势，包括 2001 年加入 WTO，消费主义的崛起，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大的人权等等，这些都是“蒙蔽”政治生活的话语和方式。

记者：有一种特文艺的说法：我们的国家好像个夜夜笙歌的大船，穿过惊涛骇浪，同时又笼罩在一种绝望气氛中，不知它将驶向哪里，这好像跟 1960 年代的美国有点像？

刘瑜：怎么会呢？1960 年代在美国来说是一个“过度政治化”的年代。那时候左派运动、民权运动、女权运动、黑人运动，反越战什么的，风起云涌，人们以为政治能解决一切。虽然我相信好的政治对于社会运转非常重要，但是政治解决社会问题终究有一个限度。当时西方来说，所有的人上街游行，要求这个，要求那个，以为政治好像是一个无限的提款机一样，按一个按纽就把想要的东西全吐出来，那不太现实。

记者：你觉得中国在未来的十年左右，会出现情绪上比较类似美国 60 年代的情形吗？政治运动频发，政治诉求过多？

刘瑜：有这种可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政府政策的走向吧。比如高压政府推迟改革，在矛盾激化时又快速解压，而不是以一种制度化的方式去疏导和解决社会矛盾，那街头政治就可能爆炸。当然这不是个必然倾向，要看政府对民意表达的反应机制。

记者：这个难道只能依靠于政府的政策吗？民间力量呢？

刘瑜：我这两天在看一本书，叫《重新发现社会》，我特别喜欢这个书名。“重新发现社会”是什么意思呢？在一个正常的国家里，很多问题可以通过社会内部的协调去解决，未必需要通过国家和政府。比如奥运会的举办机制，到洛杉矶奥运会，全世界都不愿意办了，因为都赔钱，后来到洛杉矶奥运会这次，美国把这件事情市场化了，开始拉大型广告商，卖独家转播权等等，所以开始挣钱了，很多国家又开始主动争取主办权。就是说很多事情你没有必要非通过国家去解决。中国办奥运会，有点不惜代价，所花的钱是雅典奥运会的四倍，实际上反映我们财政体制的问题，没有财政的责任概念。政府遏制 NGO 发展也是一个例子。遏制社会的自发力量，对于政府来说，实际上这样做有点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意思，因为无限的权力意味着无限的责任。现在搞得无论什么大事小事，我们都去找政府，觉得政府是唯一能解决问题的方式。

记者：关于这个事情，有一种特别爽特别偷懒的说法——这是独裁的问题。好像这是个终极原因，说出这个原因就不需要再了解其他了。

刘瑜：独裁，与那种惰性被动的文化是互为因果的。长期的独裁，导致民间的无力感，就觉得自己反正什么也改变不了，然后就什么都不干，于是独裁就更甚。但是实际上民间行动还是有一定空间的。比如如果你真的想行动，去参与灾后救灾，去捐助一下西部阳光、壹基金、动物保护这些组织，甚至去当志愿者，只要想付出努力，不是没有事情可以做。有时候人们出于偷懒的心态，就不采取什么努力，然后还埋怨是制度让自己什么都干不了，这不是不自由，而是逃避自由。

但是总的来说，人们之所以会强调制度，而较少地强调自己的责任，除了文化以外，还因为制度的改变会比较迅速，文化的改变却比较缓慢，经常需要一两代人，甚至两三代人才能够出效果。在很多国家，当社会出问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咱们选举吧。其实选举能改变什么？如果在文化和社会条件改变有限的情况下，在每个人都不为社会改良付出点滴努力的情况下，选举能改变的其实很少，之所以人们想到选举，是因为这个事情特别有操作性。

很多问题可以说是制度的问题，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制度是怎样形成的。如果制度仅仅是空降下来的，比如说就像美国空降一个民主制度到伊拉克，制度完全没有社会的、文化基础，没有民间社会的发展来和它呼应，它是非常脆弱的，不但脆弱，而且很可能换汤不换药。如果制度的变化过程是民间的力量在推动，是从公众的点滴努力中“生长”出来，有文化、经济、社会的支撑，那样的制度变化才是真的制度变化。没有这些，仅仅靠换一套法律条文是不够的。

现在大家都喜欢谈“权利”。很多人都注意到民主是一个权利文化，大家没有意识到民主同时还是责任文化。或者说，民主一部分是利益表达和争取，另一部分则是必要妥协和维持秩序。一定要有权利和责任，表达与秩序之间的平衡，才可能有一个比较健康的民主文化。如果没有这种文化的支撑，仅仅是咱们来选举吧，可能会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灾难。

记者：你在讲的时候我就想问你一下，究竟什么叫公民？其实你已经帮我解释了，除了权利的诉求之外，还有责任；表达之外还要讲秩序。我觉得你形容的是好的公民文化，

其实是建立在一种好商好量的基础上，双方都相对理智，才可能形成一个有秩序的理性表达。但是中国充斥着一种东西不是商量，而是命令。

刘瑜：你说的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比如像我刚回国，为了办入职手续，要去某一个地方提取个人档案，手续也很复杂，还要交很多钱，所谓存档费，再拿到清华大学来，把这个档案存到学校。我在国外生活了十年，对我来说这是个很自然的问题：为什么要有档案这个东西？档案是写给谁看的？好像是从小到大，老师和领导秘密地写关于我的好话坏话，不能让我自己看到，然后秘密地交给下一任老板，老板可以根据这里面说的话来奖励或者惩罚你，说不定以后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作为对你的要挟。这就是不容商量的权威文化的小小例子，会积累小小的不满。假如说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结这种疙瘩，他当然身上越来越有戾气，造成一种恶性循环。

二、民主的四个阶段

记者：提到中国的民主，总听到有人拿台湾当参照。台湾民主有好多混乱啦，好多笑话，结论是中国人还没有形成民主素质。

刘瑜：台湾的民主，有一段时间街头政治闹得很厉害，族群分化也很严重，但是总体来说，尤其是和其他的民主化的第三世界国家相比，台湾的民主化是相对健康和顺利的。你的确看到有游行示威甚至个别枪击事件什么的，但是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流血，这么大一个转型的过程没有出现大规模武装冲突，这本身就是一个成就。其次，台湾民主化过程中的很多矛盾，冲突解决方式最后都诉诸司法，比如马英九机要费案，或者陈水扁的腐败案，都是靠独立的司法力量解决，这也是比较成熟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台湾的民主相对比较顺利和平缓的。

在大陆，可能没有像子弹从脸上穿过去这种戏剧化的冲突，但是像拆迁中的自焚，很大意义上它不是我们缺乏民主的代价吗？这种代价难道不够血淋淋，不够赤裸裸，不够残忍吗？

所以，两个东西怎么比呢？我们的制度表面上最上层是风平浪静的，但是恰恰就是这种风平浪静的代价是底层的矛盾激化和冲突，黑煤窑、食品健康、矿难频发等等。大陆人看着台湾的民主制度沾沾自喜或者幸灾乐祸，未免滑稽。我们的政治丑态可能链条长一点而已，你看不到这个事情的来源在哪儿，这个事情的因和果之间可能差了几个链条，差了

几个层级，但是根子还是在制度本身，在权力缺乏制约。说难听点，人家倒霉的还是这些最上层的人，是连胜文，陈水扁，而你这里倒霉的是老百姓。

记者：台湾的民主，跟蒋经国的变化也有关系。在中国内地是不是如果上层没有变化，只靠民间，没有民主希望呢？

刘瑜：当然。在热兵器时代，没有任何上层的配合，基本搞不成转型变革。但是因为社会压力也好，因为利益计算也好，社会变化积蓄到一定程度的话，是有可能出现上层呼应人物的，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如果你呆在 1984 年的苏联，你也不会觉得苏联的改革有任何希望，然后戈尔巴乔夫上台了，而且戈尔巴乔夫也不是一开始就是戈尔巴乔夫，通过和民间改革力量的互动，慢慢地有一个意识形态上的转变，或者说被自己的姿态所绑架，形成路径依赖，由温和变激烈，反正他是慢慢地走上了民主化的不归路吧。但是，现在中国上层将要发生什么我们也不太清楚。

记者：信息极为不对称。

刘瑜：别说我们不知道他们会发生什么，他们自己可能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因为很多事情，是各种力量博弈的结果，不是一个人的决心或者意志的结果。

但是中国所谓的模仿台湾道路有困难。台湾的民主化，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所谓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的冲突生成的一个动力。在大陆来说没有这种冲突。民族主义在大陆，甚至是反民主、反自由化的力量，这和台湾不同。中国的民族主义从在整个 20 世纪以来，往往被威权主义的力量所利用，从“五四”以来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在中国，自由派就算不能和民族主义的力量结合，也至少要尽量使它中立化，使这股力量不至于成为你自由民主的一个对头。现在自由派人士动不动就骂民族主义的小孩脑残，把他们看成一个势不两立的力量，我觉得这种对立是有害的。你看东欧的民主化，它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所谓反苏联霸权主义的产物，自由派的声音要和当地的民族主义声音相结合，才会更有力量。

记者：2011 年正好“辛亥革命”一百年，大家整天缅怀民国，民国范儿，所谓那时候宪政的躯壳尚存，国事还没有沦为你死我活的革命漩涡……你觉得民国时期的民主值得借鉴吗？

刘瑜：我觉得可能太美化民国时代了。在一个绝大多数普通人都在贫困线上挣扎的时

代，讲知识分子的这范儿那范儿未免太奢侈。1910——1920 年代，政治自由言论自由，肯定比现在好。一方面当时的政治观念比现在更开放，另一方面军阀的政治能力也有限——他想更专制也没有这个能力。一个军阀就管一两个省，管不了太多。就算蒋介石政府，真正政令通行的势力范围，可能也就是江浙数省。民国的选举有财产限制，只有财产多少多少以上的人才能参与，有投票权的人有限，贿选、作弊、利益交换，千疮百孔。所以从政治自由上来说，可以说那个时候比现在好一些；但是从民主的真实性来说，没有多少学习的价值。这又回到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当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经济落后到一定程度，通过政治能改变的东西是有限度的。

记者：你对中国的民主化，还抱有期待的吗？

刘瑜：有。套用一句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说，你可以在一段时间内骗所有人，也可以在永远地骗一些人，但你不可能永远地骗所有人。经济发展，全球化，教育提高，信息多元化，这些必然会带来民众对自身权利和权力的要求，这一点中国不是例外。从民众观念调查的变化轨迹来看，中国也的确不是例外。

很多国家，像波兰、匈牙利等，转型都是统治集团里面温和派和民间的温和派相配合的结果，比较和平的改革，都是以这种形式发生的。

保守派之所以不愿意改革，无非就是因为利益，不愿意利益被瓜分，不愿意安全受到威胁。但是如果有一天他发现一再延误改革会导致更激烈的冲突，反而其利益和安全更受威胁，那就不如去迎合改革。说白了，当权者决定改革还是拒绝改革，取决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判断。

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从清末到现在，中国的当权派常常处于信息闭塞的状态，因为这个制度常常是报喜不报忧的。马屁集团的存在会使他们形成一种幻觉，以为这个体制还非常的有生命力，还欣欣向荣，人民还万众一心。前一段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个小例子，诺贝尔和平奖颁奖那天，他正好坐在一个领导旁边，他跟领导说刘晓波得奖了，那个领导就说，现在网上骂声一片吧？这个朋友就告诉领导微博上、推特上大多是赞扬声，那领导就吓了一跳：“难道在这件事情上，老百姓没有站在我们这一边吗？”

三、积极公民与消极公民

记者：民间力量崛起，大家对民主化权利有分享的要求，这个力量越来越强，越能推动下一步。那作为一个公民或者未来的公民，我该怎么做呢？必须积极吗？消极一点行不行？

刘瑜：参差不齐是社会常态，你有追求公共生活的权利，也有隐退个体内心的权利，这是常态，不能强迫人人都做积极公民，做消极公民我觉得也没什么。在一定意义上，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其实是健康政治的必要前提，所有人都成了积极公民，所有人都要这个要那个，要改天换地，其实是一个不太健康的政治。

但是在中国来说，问题并不是说我想要成为积极公民还是消极公民就可以成为，问题是要先把那些蒙蔽积极公民的因素给移开，让那些想成为积极公民的人得以去成为积极公民。如果所有人都成为积极公民，那是一种单调，但是如果所有人都成为消极公民，那是另外一种单调，另外一种扼杀。把那些蒙蔽人自然状态的权力机制或者说文化霸权移开，让人们参差不齐的自然状态呈现出来，我觉得那是一种比较好的状态。

我觉得中国现在很多所谓的消极公民，对积极公民有怨恨，因为积极公民的存在，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无力和逃避，所以对那些人反而特别苛刻，你是不是想出风头啊？想成名啊？你怎么这么喜欢暴露中国的黑暗面啊？这是我不喜欢看到的。至于你做你的消极公民，你不介意别人去做积极公民，那这个没什么，大家都做自己爱做的事。

记者：在中国谈积极公民，消极公民，起码需要先做“公民”啊。

刘瑜：对社会大多数人来说，真正积极地去关心政治，是需要经济能力、闲暇以及思想资源的，大多数人没有这个条件。还有就是搭便车心态，等着别人把这个制度搞好了，别人把秩序搞好了，我搭一个便车。我觉得任何额外在自己私人生活之外去关心公共事务的人，都在一定意义上克服了搭便车的心态，有点理想主义的情结。

四、拆除禁忌的过程

记者：你怎么看待你的“公共知识分子”荣誉称号？

刘瑜：对我来说，知识和观念传播的效果，影响公众也好，影响政府也好，都是副产品。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智识上的好奇心，这是我最原初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我把自己称为“知识分子”。现在在中国“知识分子”好像成了一个贬义词，大家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知识分子，但是我愿意把自己称为知识分子，至少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知识分子。比如说民主化是不是会必然带来社会的不稳定，比如说什么样的选举制度更有利于这种社会，国有企业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搞好，哪个国家有搞好国有企业的案例，民主国家之间是不是一定不会发生战争等等，对着这些问题，我抱有真诚的兴趣。如果有一天我失去了智识上的好奇心，纯粹出于一种悲情的使命感去做“公共知识分子”的话，会很累，很不开心。

记者：很多人都对知识有好奇心，可是选择路径很不一样，有的人就是对宇宙特别好奇。你对政治的好奇心从哪里来？

刘瑜：有点路径依赖吧。我上大学报专业的时候，父母帮我选了国际政治。那时候我是没有主见的，又在小地方，他们说选国际政治，出来当外交官，外交官听起来很好听，我也就选了国际政治。

记者：你是哪里人？

刘瑜：我是江西人。老家在波阳县，我考大学的时候在上饶市，我们家后来又搬到南昌、石家庄，现在父母都住在石家庄。父母说要你学这个，学就学呗，后来我觉得政治学还挺好玩的。当然一个人的好奇心会表现在各个方面，比如离开英国之前，我去伦敦一家书店，后来我就跟朋友开玩笑说，我是不是彻底变态了，因为我发现自己站在文学、政治学、心理学，甚至摄影这些不同类的书架前的时间是一样长的，因为对这些东西都有好奇心。好奇心是相通的，它是一个流通器。

记者：什么时候你有意识对政治学产生好奇？

刘瑜：要说发自内心的好奇心，就是对政治本身而不仅仅对关于政治的书的好奇心，其实还挺晚的，可能三十岁左右的时候。也可能再早一点，因为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比如二十五六岁左右开始，我开始上网，泡时政论坛，就像 2008 年对你的意义似的，上网对我的意义很大。《楚门的世界》那个电影，最后一个镜头，金.凯利划着船往外走，突然走到那张纸跟前，伸手一捅，纸破了，蓝天不是蓝天，白云不是白云，海洋也不是海洋了。对我来说网络的意义也是类似的，突然一天纸捅破了，以前所受到的教育，对现实的认识都被颠覆了，突然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突然不知道自己的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自己的父辈或者自己的祖辈爷爷辈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也都不太清楚了。这激发了我对中国当代史的好奇心，知识这个东西，又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为了搞清楚一个问题，得搞清楚十个问题，为了搞清楚十个问题可能要搞清楚一百个问题，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记者：你对政治的兴趣，受到家里人的影响吗？

刘瑜：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很多人会问我，你这么自由主义，家里是不是有被迫害的历史？家里是不是有老右派？不是，我父母都是那种红五类家庭，贫农出身什么的，而且都是得益于共产党革命的，属于比较主流的家庭。

记者：那你现在跟他们的交流是怎么样的？

刘瑜：不谈政治，没法谈政治，观念有代沟。我既不想正面跟他们冲突，也不可能听他们的，所以就只能是好好好，糊弄过去。

记者：有时候我想，如果中国的政治变革以一种特别激烈的方式去进行，我的父辈也许会受到影响。那时候“我们失去的只有枷锁”这句话我可喊不出来。

刘瑜：我能理解你的这种看法。所以中国的自由派，必须有能力去说服既得利益集团，尤其现在经济发展还比较好的情况下，政治变革不但不会冲击你的利益，甚至是保护你的利益。反而是如果错过了变革的时机，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动荡。既得利益集团并不是指官僚，还包括私营企业主，普通的小白领什么的，他们对自己利益的考虑，对稳定的要求，都是可以理解的。

记者：就像 1968 年的巴黎街头运动，那些学生反对的恰恰是他们的父辈。

刘瑜：近二三十年来的民主化，基本上你放眼看去，无论哪个国家都是中产阶级推动的，而不是工人农民推动的。由工人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像法国革命，中国农民起义，它可能会带来整个社会结构的完全重组和利益再分配，带来很大的流血冲突。而中产阶级推动的改革，韩国也好、台湾也好、东欧也好，都相对平和，就像你说的，他和被他推翻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阶层上的，谁也不想大规模流血，因为双方都有很多东西要失去，所以我觉得中产阶级推动的变革，对它的社会后果不用太担心，除非事情失控。

（刘瑜，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副教授。原文链接：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338-17393.shtml）

➢➢

「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开始于 2009 年 8 月，每月在香港举办一场公开讨论，并借助网络视频直播、文字直播等方式将现场放大至全球任何地方。我们希望提供独立、客观、理性的观点和论述，并关注被主流媒体忽略的议题和讨论。目前已举办二十一场讨论，嘉宾有艾未未、长平、陈冠中、贺卫方、胡泳、梁文道、欧宁、潘毅、叶荫聪、周保松、许宝强等。2011 年 6 月开始，为了丰富论坛的主题，我们在固有论坛的基础上开始一个 Co-China X 系列，这些讨论、沙龙由 Co-China 同一些友好团体合作举办，试图将更多有价值的讨论呈现于网络。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订阅此电子周刊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subscribe@googlegroups.com，也欢迎大家转发分享。

论坛 twitter：Co-China 論壇（http://twitter.com/#!/CoChinaOnline）
论坛新浪微博：CoChina 論壇（http://t.sina.com.cn/1729620664 ）
轮值编辑：胡俊熹、黄雋咏
版面设计：豆弟
技术支持：毛向辉
主编：方可成
出品人：杜婷